

簡帛文獻綱要

駢宇騫 著



北京大學
PEKING UNIVERSITY

簡帛文獻綱要

駢宇騫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簡帛文獻綱要 / 駢宇騫著.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5

ISBN 978-7-301-25784-5

I. ①簡… II. ①駢… III. ①簡(考古)—古文獻學—研究—中國 ②帛書—古文獻學—研究—中國 IV. ①G256.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088723 號



書 名	簡帛文獻綱要
著作責任者	駢宇騫 著
責任編輯	趙 新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25784-5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6694
印 刷 者	北京宏偉雙華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2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開本 30.50 印張 528 千字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75.00 圓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010-62752024 電子信箱：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部聯繫，電話：010-62756370

序 一

駢宇騫先生於二〇〇六年三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大作，本人有幸得到惠贈以後，一直放在案頭閱讀、參考，獲益匪淺。我還曾在同年五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中國古文獻學》中，鄭重向讀者作了推薦。事隔七年，現在駢宇騫先生又將出版他的新著《簡帛文獻綱要》，讀到書稿後，非常高興，謹表示衷心祝賀！

作為一名長期從事中國古文獻學教學和研究的專業工作者，我深感出土古文獻的重要性。衆所周知，我們偉大的祖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有着豐富的古代文化遺產。在這豐富的古代文化遺產寶庫中，古文獻佔據着重要地位。中國古文獻包括傳世古文獻和出土古文獻兩大類，就數量而言，傳世古文獻浩如煙海，而出土古文獻則較為稀少；但就其對古代歷史、文化、學術研究的意義而言，傳世古文獻與出土古文獻猶如藉以飛翔的兩翼，同樣重要，可以互補而不可或缺。

關於出土古文獻的重要價值和意義，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王國維先生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一文中就曾指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見。”“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見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虛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一已足以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見之金石書籍於學術有大關係者尚不與焉。”^①王國維先生還由此進一步總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如他於一九二五年寫成的《古史新證》第一章總論，針對當時疑古過頭的傾向說：“至於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並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之材料未嘗為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②“二重證據法”就是注重把傳世文獻與出土材料互相對照和印證，是一種科學的古史研究方法，也是一種科學的古文獻考證方法，已

① 王國維：《王國維遺書·靜庵文集續編》（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頁65—69。

② 王國維：《古史新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3。

久為學術界所尊奉。

出土古文獻由於發現的時間較遲，比相應的傳世古文獻減少了許多流通環節，避免了後世產生的變化、改動，甚至遺亡之厄。因此從古文獻學角度看，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義，僅就古書文獻方面而言，大致有以下幾點：第一，使不少早已佚亡的古籍重現；第二，提供了一些比傳世古籍的更早、甚至最早的本子，對於校勘和思想內容的研究均有重要價值；第三，補充了古籍傳承源流更早年代的環節，有助於古籍真偽、成書年代等問題的考證，甚至為一批被人誤斷為偽書的先秦古籍恢復了名譽；第四，在古籍的體制等方面，出土古文獻也提供了更為原始的面貌，有助於古籍版本變異、古書體例流變的研究，糾正後人對古書做出種種誤判，如以今類古、以真為偽等等。至於出土簡帛古籍之外的其他文獻，如簡牘文書之類，作為出土古書文獻的補充，更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史料價值。

公元二十世紀，是中國出土文獻主流的簡帛文獻發現的興盛時期。特別是公元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國簡帛文獻的發現高潮迭起，無論是數量之多，還是內容之廣，均非常驚人，且有豐富的古籍文獻，彌足珍貴。因此為簡帛文獻的研究提供了廣闊而堅實的基礎，隨之出現了簡帛文獻研究的高潮。駢宇騫先生所著《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就是在簡帛文獻這個主流方面對二十世紀出土文獻進行全面總結和論述的一部力作。

現在這部《簡帛文獻綱要》，是駢宇騫先生以《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所取得的豐富研究成果為基礎，寫成的一部通俗、普及性的學術著作。如該書《前言》所說：“作者有幸接觸過一些出土實物，《簡帛文獻綱要》就是通過對出土實物的研究，利用考古實物與傳世文獻記載相結合的方法，分十個專題對簡帛的起源、形制、繕寫、題記、文字以及出土簡帛的內容等方面進行了綜合的闡述，同時還介紹了出土實物與傳世文獻記載的異同。我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想從文獻學角度和學術源流角度對出土簡帛文獻進行一次梳理，以便大家能夠很好地認識和利用這些新出土材料。考慮到本書是一本通俗性的讀物，因此書中還配有許多與內容相應的實物圖片，并用通俗的語言向廣大讀者介紹這些古代文化載體的一些基本內容和知識，或許能夠更容易地讓讀者理解和接受。”作者的這一想法和做法很好，非常切合實際。因為對古文獻學，長期以來一直存在一個認識誤區，即認為古文獻學是一個偏狹的學科，實用面不廣。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以個人的切身體會，曾在《中國古文獻學史·緒言》中說：“古文獻學不僅為研究整理古代文獻典籍的專門學者所必修，對於古代學科的研究者來說，也是需要加以掌握的，因為它關係到對史料的駕御、精通和考辨。甚至對一般需要閱讀古書的人來說，知道一些古文獻學的知識也是必要的。因此古文獻學又帶有基礎學科的性質。”^①駢宇騫先生的《簡帛文

① 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緒言》，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3—4。

獻綱要》從文獻學角度對出土簡帛文獻進行全面疏理，並通過通俗的形式予以介紹，不僅以出土文獻方面的研究成果豐富了古文獻學的內容，而且還將擴大古文獻學作為基礎學科的影響，必定能實現作者的意願：“以便大家能夠很好地認識和利用這些新出土材料。”

還應該強調一點，駢宇騫先生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有紮實的文獻學知識，他一直從事傳世古文獻的整理工作，同時對出土簡帛文獻的研究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撰寫了不少有關出土文獻的著作，如《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銀雀山漢簡〈晏子春秋〉校釋》、《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簡帛文獻概述》等，可以說本書是出自專家之手的學術性普及讀物，做到了普及與提高相結合，表現出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內容科學精確，一是形式深入淺出。這兩方面都極為可貴，再一次證明專家學者寫普及著作的必要性，因為寫普及著作實際很難，“以其昏昏”是不可能“使人昭昭”的。

藉大著出版之機，寫了如上感言，聊以為序。

孫欽善

2013年6月6日於北京大學藍旗營寓所

序 二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和字騫兄一起，作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實習學生，師從朱德熙、裘錫圭先生，到五四大街老北大紅樓參加簡牘帛書的整理工作。當時這裡集中了全國古籍整理、古文字方面的一流人才，對我們而言，無疑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學習機會，故非常珍惜，十分努力。但相比較而言，字騫兄的領悟能力比我強，所以能更快進入角色，他不僅參加了竹簡本《晏子》的整理，同時對銀雀山漢墓竹簡和馬王堆帛書文字進行研究，並與貨幣文字相結合，寫出他的首篇古文字論文《試論楚國貨幣文字“異”》。畢業後，字騫兄雖然走向出版編輯工作崗位，但他仍未脫離對簡牘帛書的研究工作，他利用工作之餘，幾十年如一日，成就斐然，如《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銀雀山漢簡〈晏子春秋〉校釋》、《銀雀山漢簡文字編》、《簡帛文獻概述》等就是他的研究成果，貢獻頗大。

在紙張被廣泛應用之前，我國歷史上至少有兩千年以上應用簡牘為書寫載體。數千年間，簡牘自身有着發展變化的過程，不同時期的不同類別的簡牘，其形制與內容不盡相同，而這些差異祇有通過對大量簡牘資料的深入研究，才能產生出科學的結論，出土數量少時尚不便做全面的歸納。而今條件漸趨成熟，二十世紀至今的百餘年間，尤其是近三十年來，隨着經濟建設的騰飛，基礎建設大規模展開，古代簡牘也大量顯露地面，全國共出土百批次左右，總量約三十萬枚。出土地域包括北京、河北、河南、陝西、湖北、湖南、甘肅、內蒙、新疆、青海、山東、江蘇、江西、安徽、四川、廣東、廣西等省區，時代包含戰國、秦、漢、三國乃至晉唐，內容極豐富，不僅印證古籍所載，亦可大量彌補傳世文獻所缺、所誤，足於重建中國上古史。

今見出土簡帛大體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簡帛典籍，另一類是簡牘文書。今見簡帛典籍達百餘種之多，且很少重複。字騫兄按《漢書·藝文志》的分類，將之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等，較客觀地展示了上古典籍的面貌。正在整理中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中就有大量的經史類典籍，隨着整理工作的深入開展，將展示更多的經典，必然使我們對古書的面貌有更深刻的認識。今見簡牘文書之數量佔出土簡牘總數的八成以上，是當時實用的公、私文件，約可分為書檄、律令、簿籍、錄課、符券、檢牒六大類。關於具體的類別則衆說紛紜，其形制格式，除皇室之詔書外，極少見於傳世古籍，仍有許多尚待探索研究的課題。

鑒於出土簡帛典籍與簡牘文書的不同特點，整理手段與研究方法也不盡相同。就時代而言，簡帛典籍多戰國及漢初物，文字語言古奧；簡牘文書除里耶等秦簡外，

則西漢中期以後的簡牘居多，文字以隸書為主，草書的寫法較特殊，與後代的草書也不盡相同。就內容而言，簡帛典籍幾乎都是傳抄本，歷經傳抄後，文中之假借字、異體字甚至錯訛字甚多，故更多地涉及文字學、音韻學知識。而簡牘文書除律令外，則多數為適時形成的文件，使用的都是當時人們熟悉的語言文字，其文句多用省略語、慣用語，當時人看了一目了然。但對於現代人來說則未必如此，因此必須更多地瞭解當時的社會與制度背景，對簡牘文句才能有較深刻的認識。就整理手段而言，簡帛典籍是與傳世文獻相結合進行考證的機會更多，而簡牘文書則是按邏輯排比、編冊綴合的可能更大。固然，基於相同的載體、文字及書寫習慣，二者的共同點也很多，故可合稱之為“簡牘學”，若將之分為兩個分支則更為合理。李學勤先生云：“事實上，歷年出土的大量簡牘帛書，依其本身性質，可劃分為典籍和文書兩大類，對兩者進行整理研究的方法途徑彼此有相當大的差異，所需要的知識手段也互不相同，應該作為兩個學科分支看待。”^①同時他還指出：“學術史告訴我們，學科總是不斷細化的，但細化越繁，各個分支的交叉關係就越強，換句話說，即越需要互相關聯和結合。”^②強調了兩者間的辯證關係。宇騫兄即將出版的《簡帛文獻綱要》一書，就是將兩者很好地結合在一起的研究成果，以更清晰的脈絡，全面講述了中國簡帛的發現、整理及主要內容，揭示了簡帛整理與研究的規律，有尚佳的可讀性，對簡牘學的推廣與提高皆具積極意義。

是為序。

李均明

2013年6月於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① 李學勤：《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序，見李均明、劉國忠：《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1949—200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2。

② 李學勤：《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序，見李均明、劉國忠：《當代中國簡帛學研究（1949—200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頁2。

前言

“簡帛文獻”是指通過考古發掘等方式重新發現的古代簡牘和帛書文字資料。二十世紀以來，簡帛資料等大量出土，對於中國古代歷史與文化的研究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中國人文學科的發展方向。對簡帛文獻的研究已經成為當代中國人文學科中最為重要的顯學之一，對於學術發展和學科建設都起着重大的推動作用。

在紙張發明之前，人類用來書寫文字、記錄語言的材料是多種多樣的。在我國古代，用作書寫材料的有獸骨、陶泥、玉石、青銅、簡帛等。王國維說：“書契之用，自刻畫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為後先，而以竹木之用為最廣。”^①誠如王氏所云，在紙張發明之前，竹、木是使用最普遍的一種書寫材料，其被使用的時間亦較其他材料為久遠，甚至在紙張發明之後的數百年間，簡、帛仍繼續用作書寫材料。

從史書記載和目前的出土實物情況來看，在我國歷史上使用簡帛的高峰應該是戰國、秦、漢時期。目前我國出土簡牘總數有三十餘萬枚之多，內容大致可分為“書籍”和“文書”兩大類，大致都是戰國、秦、漢時期的實物。

但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由於簡帛出土的很少，人們對古代簡帛的瞭解祇能通過傳世文獻中支離破碎或語焉不詳的一些記載來窺見一斑，所以人們對它的感覺還比較陌生。隨着二十世紀現代考古學的發展，出土簡帛與日俱增，人們對簡帛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從出土實物的時代來看，上起戰國，下迄魏晉。從內容來看，涉及的範圍則更加廣泛：在書籍類中，凡《漢書·藝文志》所列之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等相關內容的文獻無所不有；在文書類中，包括戰國、秦、漢時朝廷及地方官府的書檄、簿籍、法律、符券、檢牒等都有發現，尤以邊塞地區出土的與屯戍、關津、驛傳等有關的資料檔案最著特色。

人們在整理和研究出土簡帛文獻時，對簡帛的起源、形制、名稱、繕寫、修改以及內容等情況有了進一步的瞭解。雖然這些簡牘文獻的內容比較零散，但仍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價值。它不僅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的文化寶庫，還填補了某些傳世文獻記載的不足。尤其是那些出土簡帛古書，對於輯佚、校勘、訂正傳世史籍以及重

① 王國維：《王國維遺書·簡牘檢畧考》（第九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頁1。

新撰寫學術史等都具有重大的啓發和史料價值，彌足珍貴。

目前，簡帛研究有兩種趨向：一種是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途徑，以文字、音韻、訓詁、校勘等方法，對簡帛文獻進行研究、考訂、校釋；另一種是歷史學特別是學術史的途徑，對簡帛文獻的思想內涵做出分析，對其史料價值進行發掘，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李學勤先生認為：“這兩種途徑彼此補充，交相爲用，沒有前者則後者失其基礎，流於浮泛；而如果没有後者則前者不得引申，簡帛佚籍的重要意義也就無法顯示出來。兩種路徑和方法表明，簡帛研究主流始終未偏離王國維先生所倡導的‘二重證據法’，注重把傳世文獻與出土材料互相對照和印證。與此同時，還需要用多學科相結合的方式開展研究。比如，必須與文獻學、語言學、學術史、科技史等領域的研究相結合，在研究過程中互相比較參證，從而得出科學結論。也祇有不同學科、不同途徑的比較，才能對簡帛文獻有更加深刻明晰的認識，更好地闡釋、釐清出土簡帛中的許多疑難問題。誠然，‘二重證據法’和多學科結合的方式，將會推動簡帛文獻研究水平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但在我看來，把考古學成果與學術中的研究溝通起來，不啻爲一項非常艱難的工作。因爲就簡帛佚籍而言，不限於利用已有的簡帛釋文談論學術史，而是要把考古學、古文字學的研究方法和文獻學、歷史學真正打成一片——一方面以學術史已有的成果去考察衡量新發現的佚籍，另一方面則以考古學、古文字學的知識和方法來整理研究簡帛，與傳世文獻對比參照，從而推進學術史的研究。”^①

簡牘文獻作爲地下出土的第一手資料，當然要比歷代傳世文獻更接近原貌，它能夠客觀地反映出當時的歷史狀況。作者有幸接觸過一些出土實物，《簡帛文獻綱要》就是通過對出土實物的研究，利用考古實物與文獻記載相結合的方法，分十個專題，對簡帛的起源、形制、繕寫、題記、文字以及出土簡帛文獻的內容等方面進行了綜合的闡述，同時還介紹了出土實物與傳世文獻記載的異同。該書內容的敘述有詳有略，在介紹出土實物的同時，我們對有關的簡帛知識也做了相應的講解，對有關的學術問題我們也做了一些研究和探討，有些是徵引了學界同行師友的研究成果，有些是我個人的看法或自己讀書的一點體會。我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想從文獻學角度和學術源流角度對出土簡帛文獻進行一次梳理，爲讀者提供一些較爲完整、實用的簡帛知識，以便大家在學術征途上能夠很好地認識和利用這些新出土材料。

考慮到本書是一本通俗性的讀物，因此書中還配有許多與內容相應的實物圖片，并用通俗的語言向廣大讀者介紹這些古代文化載體的一些基本內容和知識，或許能够更容易讓讀者理解和接受。

在本書撰寫時，作者參考了不少同行師友的研究成果，爲不至掠人之美，在徵

^① 李學勤：《我們的很多行爲邏輯，正是從那個遙遠年代而來》，《文匯報》2012年7月30日。

引之末，皆注明原本之所從來，在此深表謝意！我的老師孫欽善先生、我的同學李均明先生，他們是文獻學和簡牘學的專家，能在百忙中為本書賜序，予以鼓勵，更是感激。但是由於自己的水平有限，講述中肯定還會存在這樣那樣的錯誤，《詩》云“嘒其鳴矣，求其友聲”，在我將這本小書奉獻給廣大讀者的同時，也誠懇地希望能得到同行師友和讀者的批評指正。

駢字騫

癸巳年良月於北京大興翰林庭院寓所

目 錄

序 一 孫欽善	1
序 二 李均明	1
前 言	1
第一章 簡牘、帛書的起源	1
第一節 簡 牘	1
第二節 帛 書	3
第二章 簡牘的形制	7
第一節 簡牘的取材	7
第二節 簡牘的製作	12
第三節 簡牘的長度	17
第四節 簡冊背面的劃痕	30
第五節 符券的刻齒	32
第三章 帛書的形制	35
第四章 簡牘的名稱與編聯	41
第一節 簡牘的名稱	41
第二節 簡牘的編聯	62
第五章 簡帛的繕寫與削改	69
第一節 簡帛的抄寫工具	69
第二節 簡帛的削改	84
第三節 簡牘的容字	85
第六章 簡帛的題記	91
第一節 簡帛書籍的題記	91
第二節 簡牘文書的題記	124

第三節	簡帛文獻的統計尾題	132
第四節	簡冊的編碼	136
第七章	簡帛的符號	141
第一節	●(黑圓點)	142
第二節	■(黑方塊)	147
第三節	▲(黑三角形)、▣(紡錘形)	149
第四節	○(朱色、黑色圓圈)	149
第五節	√、—(橫畫)	151
第六節	=、一(重文號)	159
第七節	特殊語境下的“重文號”	163
第八節	=(合文號)	167
第八章	簡帛的文字	171
第一節	戰國楚系簡帛文字	173
第二節	秦系簡牘文字	181
第三節	漢代簡帛文字	183
第四節	簡帛的異體字	186
第五節	簡帛的假借、通假字	193
第六節	簡帛的合文	198
第九章	出土簡帛書籍	202
第一節	六藝略	203
第二節	諸子略	247
第三節	詩賦略	276
第四節	兵家略	281
第五節	數術略	290
第六節	方技略	317
第十章	出土簡牘文書	331
第一節	簡牘文書	332
第二節	書檄類	334
第三節	簿籍類	356
第四節	律令類	378
第五節	案錄類	400

第六節	符券類	410
第七節	檢牒類	422
第八節	遣策與告地書	428
附 錄	二十世紀主要出土簡帛資料	442
第一節	戰國楚系簡帛資料	442
第二節	秦系簡牘資料	450
第三節	漢代簡帛資料	454
第四節	三國吳簡資料	465
第五節	魏晉簡牘資料	466
第六節	唐代簡牘資料	469
後 記		471

第一章 簡牘、帛書的起源

紙發明以前，人類用來書寫文字、記錄語言的載體是多種多樣的，在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人類曾使用過不同的書寫材料。如古埃及人以紙草作為書寫材料，美索不達米亞人以泥版作為書寫材料，迦勒底人以磚頭作為書寫材料，古希臘人以蠟板作為書寫材料等等。在我國古代使用過的文字載體則更多，有龜甲、獸骨、陶泥、玉石、青銅、簡牘、繒帛等。王國維說：“書契之用，自刻畫始，金石也，甲骨也，竹木也，三者不知孰為後先，而以竹木之用為最廣。”^①誠如王氏所言，在古代中國，自商代起始一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簡帛就是那個沒有紙張或紙張的使用尚不普遍的年代裏最主要的信息傳播載體。簡帛作為通用的書寫材料，至少有二千多年的使用歷史，它使用的時間最長，也最為廣泛、最為普遍，甚至在紙發明以後數百年間，簡牘仍繼續用作書寫文字的載體。

第一節 簡 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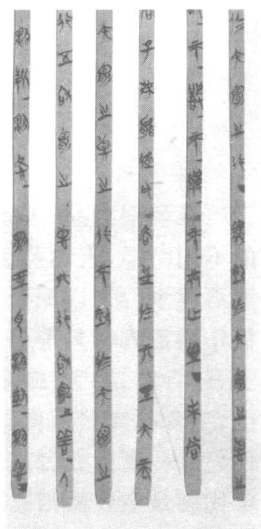
所謂“簡牘”，就是指我國古代用來作為書寫文字的載體——“竹簡”和“木牘”等的合稱。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簡，从竹，間聲。”“牘，書版也。从片，賣聲。”“片”就是指剖開的木片。《論衡·量知篇》曰：“截竹為簡，破以為牘，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槩，枘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②“槩”，指牘之未成者，《說文解字》中說：“槩，牘樸也。”《玉篇》曰：“槩，削板牘也。”王國維在其《簡牘檢署考》中說：“牘之未製者必長於常牘，故牘之長者亦稱為槩。”^③由此，我們知道早期的“簡”一般是指竹質的書寫材料，“牘”一般是指木質的書寫材料。但是“簡”、“牘”之區別，亦並非完全指材質而言，有時也指形制而語。窄者為簡，寬者為牘。竹木既可為簡，也可為牘。版牘多以薄木板為之，也有以竹板為之者。沒寫字的木板叫“版”，寫了字的叫“牘”；“版”多是長方形的，因此也叫“方”。“簡”則多用於書寫書籍、律令、重要公文；而“牘”則多用於一般普通文書，即賬簿、私人信件及地圖等。從考古發掘出土的實物來看，竹木簡牘大量存在，祇不過是南方多竹簡、竹牘，而北方多木簡、木牘，乃地域的物產使之然也。

① 王國維：《王國維遺書·簡牘檢署考》（第九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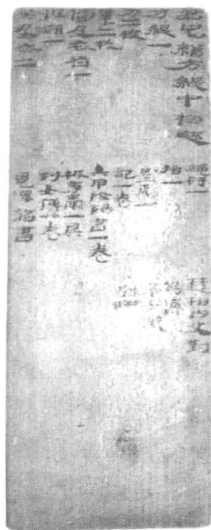
② 黃暉：《論衡校釋·量知篇》，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551。

③ 王國維：《王國維遺書·簡牘檢署考》（第九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頁9。

簡、牘作為書寫材料到底始於何時？多數學者研究認為當在夏商之交。李學勤先生認為：“《尚書》中有一篇《多士》，講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就是書，‘典’則是大册。商周文字的‘册’字是個象形字，若干直筆像一支支的簡，中腰的橫筆像用以編連各簡的組繩。‘册’字的這種結構，在今天用的楷書‘册’字還可見其仿佛。現在已發現的殷商時代的甲骨文裏就有‘册’字，而且甲骨文還把當時專職用簡寫字的史官稱為‘作册’。由此證明商代確在使用簡，祇是迄今在考古發掘中尚未找到簡的實物而已，這可能是竹木在地下不易保存的緣故。”^①前些年，山東鄒平丁公出土了龍山文化晚期的陶文，有一個看來從“册”的字，李學勤先生認為，“如果理解不差，說明相當夏朝初年的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就存在簡册”。^②鄭有國在《中國簡牘學綜論》中說：“我國使用簡牘究竟始於何時呢？據地下出土的簡牘，最早的是在公元前五世紀後半葉，即戰國早期。但從文獻記載和甲骨文



竹 簡



木 牘

字的分析，至少在殷商時，我國就使用簡牘作為書寫材料。《尚書·多士》篇稱‘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金文的‘册’字作‘𠔁’，‘𠔁’像把若干條竹木簡用兩道繩子編成一册書的樣子。‘典’，金文寫作‘𠔁’，《說文解字》解釋‘从册在丌上’，即把‘册書’放在丌上。殷商時代的典册是否用竹木質的簡牘呢？至今尚無實物出土，但殷商時的玉册倒發現不少。根據出土的這些殷商玉册，是否可以作這樣的分析：殷商時的‘典册’使用的還是比較貴重的玉質典册，因此使用不普遍。隨着文字的普遍推廣，這種珍貴的玉質典册，才被各地習見的竹木條取代。”^③

從目前出土實物來看，戰國楚簡出土較多，秦代簡牘也多有發現，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司空》中就有“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𣎵(柔)可用書者，方之以書；毋(無)方者乃用版”的規定。^④漢代簡牘的發現就更多了。可見，戰國、秦、漢時期是簡

① 李學勤：《中國歷史研究知識手冊·簡牘帛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277—278。

② 駢宇騫、段書安：《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李學勤《序》，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頁1。

③ 鄭有國：《中國簡牘學綜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頁1—2。

④ 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司空》，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50。

牘使用的鼎盛時期。

書寫材料是隨着人們對新材料的不斷發現而逐漸演變的，而這種演變是緩慢的，在紙未普遍使用之前，竹木簡牘就是當時主要的書寫材料。

“秦簡”、“漢簡”等名稱是後人的叫法，因為它是秦代的“簡”或漢代的“簡”，故名曰“秦簡”、“漢簡”，如同魏晉時的簡稱為“魏晉簡”一樣，皆冠之以朝代名，以示區別。

簡牘的編冊制度，是我國後世書籍制度的濫觴；簡牘的文字，不僅對研究我國古代文字的發展變化提供了重要的文字資料，還可以欣賞到我國古代書法的精湛藝術。

簡牘文獻的發現，不僅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學術視野，給先秦、秦、漢典籍的整理以及上古文明史的探索，帶來了新的契機，並促成了有關新興學科的迅速發展，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的文化寶藏，對於促進古文獻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義。王國維先生在清華研究院作《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的著名演講中就已明確指出：“古來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現。”^①殷墟甲骨文的發現，極大地推動了古文字學和殷商歷史的研究；敦煌遺書的發現，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新的顯學——敦煌學；內閣大庫元明以來書籍檔冊的發現、簡帛文獻的大量出土，也大大促進了相關領域的研究。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簡牘文獻的大量發現，將在很大程度上為改寫中國學術史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出土簡冊

第二節 帛 書

“帛”也是在紙未發明以前與“簡牘”並行的一種書寫材料。《墨子·兼愛下》云：“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②墨子是戰國初期的思想家，他並非與“先聖六王並世同時”，也未“親聞其聲，見其色”，之所以能知道“先聖六王之親行”，就是靠流傳下來的寫在竹簡帛書上的文字記載而得知的。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飼養家蠶和織造絲綢的國家，但飼養家蠶從何時開始？現在還無法考定。但從古書的記載來看，在殷商時代，我國蠶絲業已經相當發達，在

① 王國維：《王國維遺書·靜庵文集續編》（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頁65。

② 吳毓江：《墨子校注·兼愛下》，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178。